

2015年元旦过后,我们在某地佛学院对宁铂进行了独家采访。当一位清瘦、黑瘦的宁铂师傅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很愕然——当年少年班那个万众敬仰的胖乎乎、白净净的“神童”形象已荡然无存。此后与我对话时从容的语速,也与《实话实说》栏目视频中那个急于表达的宁铂截然不同,唯一没变化的只剩下挂在嘴角边的一丝腼腆和与人交谈时依旧低垂的眼神。

作者:从小学、中学到少年班,又从中科大到佛学院,您走过的路有“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佛门?

宁铂:准确地说,我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学校,在中科大待了19年,现在到这里(佛学院)也还是教书。

作者:谈到我们国家的教育,似乎已经成为当下最受国民诟病、吐槽的一个领域,您认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宁铂:出在“利益导向”。当整个社会导向趋利时,教育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应试教育其实也就是社会利益导向的体现。什么东西容易出政绩,学校就去追求什么。老师教出一个高尚的学生,要等学生盖棺定论才算数,但分数高低,却是马上就见分晓。

比如说奥数班。一个朋友的儿子因为父母比较注意全面发展,不主张儿子参加奥数集训,结果孩子在上高三的时候,数学还不会用复数。我说你怎么可能不懂复数,高一就应该学习了?他说:“这些东西我们没学,只有奥数班才学。”

作者:对普通教材降低要求,无异于给奥数班提供了盈利余地。听说有些学校或老师,为了逼迫孩子上高学费的奥数班,甚至把教材里必要的东西抽出来不学。

宁铂:是。再举个例子,我在华东某市给一个小学五年级男孩做心理辅导,孩子不肯上奥数班,怕难。家长说难什么难,我们来试试,结果一堆大人啃不下小学五年级的奥数题,什么“鸡兔同笼”,初中不定方程一下解决了,你干吗要提前难为孩子?故意把学习复杂化,让人觉得孩子成才非得要上奥数班,教育活动变成了利益博弈。

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人,想必都读过鲁迅的《藤野先生》。殊不知,在日本,特别是仙台,藤野严九郎也因为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变得有名。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县建立了“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和“惜别”碑。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现属的日本东北大学设立了“藤野先生纪念奖励奖”。

1973年,日本各界成立了专门的记录调查会,搜集和考证有关鲁迅在仙台一年零七个月的留学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字和影像史料,进而成立了“东北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后来,课题组把搜集到的照片集的电子复制版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披露了一些国内不常见的资料。

在照片集中,有一份藤野先生的亲笔履历书,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被仙台医专聘为教师时提交的,上面记录了他的学习经历、工作履历以及工资变化——从月俸5元一步步升到年俸480元。履历并无不凡之处,这个年俸也是教授薪资等级里面最低的。鲜为人知的是,藤野是在鲁迅入校

「灯下碎语」 「神童」宁铂： 从象牙塔到佛塔

作者:谈到早慧教育,这些年,社会各界对少年班也有不少质疑与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先有“第一神童”宁铂,才有中国少年班。您怎么看?

宁铂:少年班的智力发展、学习能力都没有问题,但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正好处在相当于别人中学的时间段。这个年龄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和应激能力不够,心理承受力、抗打击能力和社会经验不足,而社会经验不足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尽管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与他们在后继的人生中遇到的问题相比较,有如“小巫见大巫”,但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却都是“第一次”,适应起来很困难。因此,教育理论不主张这个年龄段的人离开父母,尽管表面上看,他们在家也会老跟父母唱反调,可实际上还是非常需要父母信任式的、陪伴式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和支持。实践证明,过早让孩子读大学,是违反教育规律的。

作者:既然如此,从最早你们那一届算起,中科大的少

年班也办了几十年了,它的出现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宁铂:当年出现少年班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国家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科技界也像体育界一样搞“锦标战略”。工科、文科、农科、医科、化学、生物都是实践性学科,不容易快出成果和人才,只有数学、物理能快得起来。加上当时主流媒体对杨振宁、李政道和陈景润等先生的宣传,都被有意无意导向“锦标主义”,所以那时候尖子学生的第一志愿不是数学就是物理。

少年班也一样。李政道博士我个人非常尊敬他,他给中央领导写信的想法很朴素,“孩子们集中到一起发展是不是更好?”但是国家却因此把少年班列入战略计划。可以这么说,少年班并不符合教育规律,而且“出生就带了病”。

作者:哦?带了什么病?

宁铂:在一段时间里,前苏联儿童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是少年班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孩子只要有潜力就可以用非自然的发展方式培养。我认为“最近发展区”能够被利用的前提,是“达成健康发展的客观条件的满足”。如果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发展方向”就会发生偏移,容易在教育领域导致“大跃进”式的、“瞎指挥”式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佛家的角度来看,就叫“不遵循缘起法”。事实可以说明问题,高峰时全国有13所高校都开办了少年班,但绝大多数学校发现问题后无法处理,所以就只能停办。

作者:中科大最早开办少年班,有没有出现过类似其他学校经历的难题?

宁铂:不会没有。少年班从发展到稳定,足足用了20年时间。其间部分少年班成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成绩或心理发生波动,有些人尤其是外校的人幸灾乐祸,如果不是中科大老师们顶住压力,凭着对学生的爱心坚持做了很多工作,就很难把少年班的理念传承下来。

作者:您认为“理想的超前教育框架”,应该是怎样的?

宁铂:德育成长贯穿人的一生,难言超前。智力发展可以超前一点,但到了30岁之后,也会进入缓慢成长的类似于“饱和”的状态。这么多年,我在少年班只看到两个真正智力超常的学生,一个是谢彦波,另一个是00班的女孩苏淑芳,其他人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学出来的。学习能力方面,谢彦波特别厉害,那位女学生特别善于用巧劲。尽管他们小时候聪明,但长大后还得要适应成年人的社会才行,否则就会在社会生活中遭受挫折,难以达到理想的高度。

作者:对于少年班的学生,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舆论设定,你上了少年班,就理应成功。

宁铂:这种舆论本来就是错的。少年班的读书时间只有几年,在一个人一生中占多大比例?张亚勤、郭元林等少年班毕业生的成功,与其说是少年班给的,倒不如主要归功于他们在社会上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打拼。

作者:也有人提出,高校少年班的推出,目的是吸引眼球,抢生源。

宁铂: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搞教育不能太过功利。前面说过,上世纪80年代,学生的榜样都是李政道、杨振宁、陈景润那几位先生,其实杨振宁、李政道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之后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光环上。当时倡导学习他们的目的,与体育界长期以来用“金牌战略”冲击“全民健身”的道理相似。

接下来,1983—1986年出国潮,孩子从小就一窝蜂学外语,目标锁定出国;1988年之后经济热了,时髦学经济、学会计;1995年之后时髦学管理;2000年之后又时髦学金融……整个社会教育的导向很明确,社会上什么吃香,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学校就开什么课,考试就考什么,志愿就填什么……

(摘自《天骄之殇:真实记录中国教育30年典型事件》,吴树 蒋铮著)

【书中风云】

来自溥仪弟媳的口述史： 清军用膳爱用西式餐桌

爱新觉罗·溥杰17岁时,瑾妃将满洲贵族之女唐石霞许配给了他,这段婚姻因侵华战争前后,日本人执意要溥杰娶日本妻子而终止。上世纪40年代,唐石霞前往香港画画为生。作为溥杰的原配夫人,她见证了清朝皇族在紫禁城最后的日子。

当年我在宫内陪伴我的四姑母瑾太妃时,紫禁城内同时居住的晚清皇室人员,只有同治皇帝的三位贵妃:珣太妃、瑜太妃和璿太妃;再有就是已然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他的皇后婉容、皇妃文绣等人。皇族虽只是数目不多的一些人,但是膳食的定制一直承袭着清室遗留下来的旧习不变。

先说说膳桌,这可能会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宫廷里皇帝妃嫔们用的既不是八仙桌,更不是普通的方桌、圆桌,而是类似欧陆西方喜用的长方形餐台。这种官中所用的膳桌是长方形的,它的长度约莫有三四张八仙桌并在一起那么长,逢有外客来时,便在大殿上进膳,而且还可能要把膳桌再加长些。膳桌很长的原因很简单,各官三餐的菜最少有三四十种,小桌子是无法摆放的。所以,当时皇帝官妃或者亲友们吃饭时,必然有指定的太监在旁伺候,太监会把吃者够不到的菜肴夹到布菜碟里,供其享用,如果吃饭者想品尝什么菜,只消用眼看一下那道菜的位置,太监必心领神会,立即走过去将菜夹过来。

膳桌上铺设的台布当年称为“桌衣”,宫廷膳桌的桌衣与西洋的餐桌台布不同,通常不是白色而是彩色的,平时四姑母与我或其他自家亲人吃饭的桌衣,单色绣花的居多,大节日或是招待客人的桌衣则是绚丽的绣花锦缎了。用膳时主位是设在横头的一面,其余的座位算是客位,按尊贵程度或长幼次序分由两旁排列开来。按照右为上的原则,主位右侧的第一个位置是最尊贵和重要的客座,这两个座位距离最近,而且呈九十度角,便于主客在餐饮期间说话交谈。与主位正对面的膳桌另一端位置,与西方餐桌不同,是从来不会设置座位的,只是放些小瓶、小罐、小碟之类的调味品。

宫廷里的膳食确实多种多样,粤菜、川菜、鲁菜、徽菜都有,当然常以京菜为主。其实,中国的八大菜系并无京菜,所谓“京菜”是把北京、山东、满蒙的某些菜肴综合而成的宫廷常用菜。

很特别的是,清官的菜肴禁止吃牛肉,所以没有任何与牛肉相关的菜,这不是由于宗教信仰或是迷信说法形成的,而是因为满人认为牛是为人们耕田和拉车的好帮手,像马、驴、骡一样不可食用。宫廷的这个习惯甚至影响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北京市民吃牛肉虽不被禁止,但是吃牛肉者很少。直到民国之后,牛肉菜肴才在北方逐渐增多。

内官地方很大,各官都有一个自用的小茶房,不过,没有做正餐的膳房。比如我们住的永和宫、建福宫,或者皇后婉容住的储秀宫等宫殿,都各自有小茶房,每日下午吃些小茶点时,就由各官小茶房自行解决,但是,各官的每日三餐一律由御膳房烹制送来。

皇宫膳房的规模极大,它设置在离其他各官室殿堂较远的偏僻角落,以免炒菜做饭的烟火污染皇室办公和帝后妃嫔的居住环境。紫禁城内的膳房只此一家,距离各官各殿却远近不同,每日三餐仅仅送饭就是一个相当急迫紧张的活儿,太监们要计算出各官送饭的路程远近,要保证紫禁城内各官在同一时间开饭,而且必须风雨无阻准时送达。官里上百年形成的习惯做法是,只要听到一声传膳指令,便须在极短的时间里,将数十样菜肴送进各官。为了使菜肴不至于冷到无法进食,送饭太监还要将所有的盘碗都加上盖子,一律装在保温的金漆食盒里,只要听得一声吩咐,便立即摆放在膳桌上了。

(选自爱新觉罗·溥杰夫人口述史《我眼中的末代皇帝》)



藤野(教室正中穿西服站立者)和学生在解剖室

「阅案所得」 曾手抄《论语》 藤野先生

前两个月,才升任为教授的。并且在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系时,还因资格不够而被迫辞职。求职无果,藤野离开仙台,回到故乡福井县芦原市开办诊所。

一张“藤野医院”的照片里,墙上挂着藤野先生穿过的短大衣,架上整齐地摆放着藤野先生用过的皮包和一些医疗器具,擦拭得非常干净。另外两张:一本诊疗簿和一份诊断书,字迹还清晰可辨。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几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照片。藤野小学时学过汉字和汉学,老师野坂源三郎教授的是朱子理学。一张有关藤野藏书的照片,是一本泛黄的线装书《近思录》,这是朱子学的入门书。一本藤野先生亲手抄写的《论语》,用毛笔工整地写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

这些反映藤野汉学修养的照片,虽是情理之中,却也在意料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竟然在甲午战争后对一个学习西方近代医学的日本人仍有一定的影响!想必藤野先生当年看到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亲切感吧。所以藤野在晚年回忆鲁迅的文章《追忆周树人君》中写道:“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所言非虚。

照片集中有一张是岩波书店出的日文版《鲁迅选集》,这恐怕是仙台一别后,藤野先生收到的唯一有关鲁迅的物品了。1934年,鲁迅的日本弟子、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询问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的收录作品,鲁迅回信答一切随意,“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1935年,增田涉将这些事写信告诉藤野严九郎,并随信寄去了一本《鲁迅选集》,也就是照片中那的一本。时年61岁的藤野先生才得知以前的学生周树人成了作家鲁迅。

(据《人民政协报》)